

长征计划 — 延安艺术教育

座谈会总结和闭幕式：卢杰发言

节选自：长征计划 — 延安艺术教育座谈会总结和闭幕式

发言时间：2006年5月23日 上午10:50—13:10

地点：抗大宾馆六楼会议室

发言人：卢杰

坐在前面的是今天正式邀请的与会代表。后面坐的是参加长征计划的艺术家和本地的艺术教育工作者。

长征计划延安艺术教育座谈会，最后一部分的座谈以及闭幕式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欢迎许江院长、范迪安馆长、罗中立院长在百忙之中，交通如此不便的情况下，能够赶来参加这次会议。首先我介绍一下，长征计划延安这一站的几个项目。

艺术长征到达延安和历史上一样，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在延安目前实施的几个项目有：

一、著名艺术家蔡国强发起，由长征组织策划的延安艺术教育座谈会。

二、有30多位艺术家，40多件（组）作品，在延安地区陆陆续续展开实施。其中在桥儿沟天主教堂遗址，也就是前鲁艺的旧址，有5位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在延安大学旧址的11孔窑洞里面有10位艺术家的作品；在我们所开会和居住的抗大宾馆有9位艺术家的作品；分散在不同的位置。同时延安地区现阶段，一直到今后的一、两年期间，有多位艺术家的作品以“信天游”的形式流动地在不确定的公共空间实施展出。其中包括陈少峰非常漫长的长达几年的一个和被画对象，互相关照，互相写生的一个计划，还有颜磊、姜杰等在这里实施的作品，这些都会多年持续地发展。长征延安的另外一个项目就是“看场地”计划。所谓的看场地就是我们所习惯的体验生活，由于长征活动过去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条件的限制和工作的局限，我们长期以来受到很多的批评，就是没有请艺术家“看场地”，没有体验生活。所以这次我们邀请了全国一批优秀的活跃的艺术家来参与座谈会，来观察，并为在这里实施的其他艺术作品提出意见。同时更了解长征计划，为今后参与长征计划做准备。

除此之外，长征计划在延安还有一个三年的工作计划，就是延安地区小学美术老师的培训计划。这个计划已经获得了福特基金会部分资金的赞助和支持，这个计划是长征对艺术教育的关心的全面体现。从1998年我开始策划长征计划，一直到2002年邱志杰加入到长征的工作里面，不管我们在下乡体验生活中，还是在北京和国际上共同探讨策划过程中，我们一直都能感受到当代艺术的发展中，有两条若隐若现的路线是绝对不能回避的：一条是对传统、民间资源的认识；一个是对艺术教育的关注。

这个小学美术老师的培训计划是非常现实的一个出发点。我们在长征计划在延安的实践过程里面，深深地体会到几点问题：

一、由于社会上对教育的功利主义和产业化倾向，造成了在根部的社会基础里面，不太具备经济和行政资源，能够拥有小学美术老师。

二、即使拥有，精英主义职业发展的动力会使很多来自美院和师范大学的学生在这里呆了一段时间就想要回到都市，进入精英的艺术创作领域。当然这个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就会在民间，孩子们的教学需求上产生一个空缺。

三、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有人在教，他们使用的是全球化反映下中国通用的艺术教育的教案和大纲，这种普泛性的、不关心不理解本土性和本土特质的教学大纲里面存在各种问题。

这使真正意义上积极的小学、中学美术教育产生很多缺失。

我们这一个计划就是根据这个情况产生的，基础就是陕北地区的一些民族、民间传统的艺术形式。比如剪纸，是陕北孩子们最熟悉的资源之一，是他们最能够理解的一个生命意识。它是通过自己的祖母、母亲获得的爱的教育，通过巫师文化，或者符号文化，通过从宗教从本地的一些仪式获得的一种视觉表达的符号。这种教育其实是一直在生生不息地绵延发展，但是如何能够用现代教育的方法论和经验，由现代教育家和艺术教育者在尊重剪纸原创性和保留传统发展要素的前提下，帮他们整理出来，成为一种可流通的，简单明确又生动灵活的材料。这是我们计划实施的第一阶段的目的。通过组织这些就在孩子们身边的村里的优秀的剪纸艺术家，把他们的这种经验和知识，通过现代教育的方式总结出来，形成一种教材去推广。相对来说这个与以往民间民办老师的模式相似，得到了地方县政府的同意，在文化局、教育局的支持下以试点的方式展开。这个计划预期时间是三年，在这里我向大家汇报。

下面利用一点时间对这两天的“延安艺术教育座谈会”的情况做一个综述，以便于我们能够利用今天这个宝贵的时间进行最后一个阶段的座谈。

本次座谈会设定了三个主要的议题：

一、中国艺术教育的现状和认识。

长征基金会董事，英文《中国当代艺术》总监，著名策展人、教育家郑圣天老师的发言回顾了中国艺术教育的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转型，对比了80年代教育改革之艰难和今天开放改革的成就。发言主要提出的是“艺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专业人才、成名成家还是普遍人才、人文修养的教育。发言希望能够注意师徒制的局限，提出艺术教育应该是实验性的创造力的现场。

华南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皮道坚先生回顾了中国百年现代艺术的教育史，尤其是80年代的艺术教育讨论之后，艺术教育改革无法展开的原因。他提出了艺术教育的结构性问题，众所周知的改革的困难和阻力。艺术教育规模普遍发展迅速，但教育成果不平衡。主要依赖有勇气、有魅力、有前瞻性的领导，学生才能幸运地得益于所就学的校园中多元、有机、当代的教学资源。多位发言者都谈到了现有艺术教育体制的弊病，其中包括极端、过分的技能教育方向；人事制度、招生制度；行政对业务的干预；教育产业化过于扩大与膨胀；学生质量、素质等问题，以及全国教学评估检查制度的利与弊，制度严格化、图表化不等于制度的真正合理优化。

面对以上种种困难，与会者时常会悲观，有挫折感。讨论也经常地倒向应该在现有教育体制之外，以民办、私立、同仁办学去创建更自由的、合理地反映时代特征的，新形态的艺术教育实验场。但是同时也都承认，这种学校在资金、资格审查、学位颁发权利方面会有难度和制约。

有许多发言者强调要坚持发扬知识分子的奉献精神和教育工作者的责任、道义和方法，要积极坚持、执着参与，要创造性地在已有条件下作出贡献，以打开局面。隋建国老师介绍了他任教的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情况，是保留原有系统，加入新的系统，以达到与亚洲其他现代化先进国家和地区艺术教育的同步。其中，传统的工作室两个，观念性的工作室两个，公共艺术服务于社会的工作室两个，三者共同构成一个个体与集体、对立与和谐的互补关系。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21世纪发展研究院院长，著名教育家杨东平先生在发言中谈到的是，与当代艺术教育联系但是更广泛的中国当代教育的问题，批评了现有的功利主义的倾向。大学成为官场，实用主义泛滥，理想主义丧失，但是同时积极的、一再地肯定，现有教育体制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不仅仅现有的体制一直在思辨、在进步、在吸收各种的力量和建议，同时也可以在其中开办特区、试点，以达到推广。另外，杨先生建议，类似于长征这样的民间版本的力量奉献，对教育改革的促进，意义同样重大。

杨东平先生在发言中提出，要重建教育的理念，如陶行知的生命、生活教育之为当时新

民主主义的文化组成部分。建立注重个性发展的来自于的生活教育，为改善生活的教育。从这个话题，诸多与会者提出我们讨论艺术教育，不仅仅要讨论高等艺术教育，也要关注儿童、中、小学艺术教育，和民众社会生活艺术教育的重要性。

皮道坚先生和其他与会者不断提到，当代艺术教育是当代教育的主要资源之一。要培养文化土壤，要从娃娃做起。皮道坚先生把这个流程概括为艺术、人文、开放、互动。艺术是学科，人文是底蕴，开放是态度，互动是方法。同时皮道坚教授提出：要扩大社会公共领域，扩大整个艺术机制对当代艺术成果的接受面，才能转化为有效的当代艺术的教育方式。如何教育决策者和社会大众，当代艺术的成果和它的积极意义，有益于提升社会主体对当代艺术教育系统建设的支持。

文化部对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吕军先生的发言中主要从自己多年工作的经验和角度，介绍了国家、政府是如何认识到现、当代艺术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日趋重要的时刻已经到来。在国际文化现场中，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成为中国整个社会创造性的象征之一，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强大的文化竞争力。他谈到当代艺术在中国正处于上升期，只要我们的艺术教育和我们的艺术创作两者能够像今天这样的互动，我们当代艺术的教育和创作就能够不断地步步高升。

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胡和立局长在多次发言中，不断肯定当代艺术的成果已经成为社会主体文化的积极要素，是创造性社会的动力。但同时也从自己工作角度指出，教育改革的紧迫性与艰巨性，提供了很多数据和现实因素的分析。他介绍了新一代被教育者和我们这几代人的不同，一再强调如何因材施教应该是讨论的重点。

座谈会的第二部分主题为“何为当代艺术教育？”

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先生发来的书面发言中，强调当代艺术教育应该以现代艺术为基础理念。因为现代艺术中包含着传统艺术和古典艺术的一切理念和方法，同时又具有传统古典艺术所未能触及的地方。这些部分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艺术和人的新的关系，它不仅反映社会的现实，反映着信息的爆炸，而且引发了人的原创性，人之为人这一基本素质和权利的发挥，也训练着作为一个艺术家，对人生、宇宙的对立思考和自由批判。他认为当代艺术教育的第二个标志应该是以新技术、新门类、新媒体为教学主导作用，应该是通过新的教育方式，促使学生艺术观念的改变，而不是停留在艺术技巧的培育上。他提出的第三点，当代艺术教育的重要之处应该是以现代管理制度为组织形式。围绕着何为当代艺术教育的讨论，主要是实验性的教学和系科的设立之重要性。

著名批判家、策展人，王南溟先生和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系主任李公明先生在彼此不同的发言中，强调个性化教育与批判性自由表达的意义应该贯穿在对学生的教育的一个过程里，使艺术渗透到公共生活领域。应该打破古典的保守的教学理念，和已有的教师结构所带来的对实验性教学和当代理论的排斥和拒绝。

中央美院版画系副教授、飞地艺术工作坊的创办人王华祥介绍了他在体制之外做独立的艺术教育工作坊的经验和挑战。他强调差异性的研究，要肯定古典系统所提供的观察和综合概括能力，但必须有反向教学系统来强调冒险性和挑战性。教育的目的是重新找到人与社会的关系与责任。

台湾东海大学美术系主任兼专任教授倪再沁先生介绍了台湾的经验。他提出，科学能动的教育体系得益于体制之外的教改团体的挑战和监督，以及体制之外不同类型的教育系统的实践所产生的竞争、批评与修正作用。

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总体艺术工作室负责人之一邱志杰强调了学院的自我否定因素的重要性。他回顾了几大重要美院在中国现代艺术史和当代艺术史里面之所以产生了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的原因，是来自于不同程度的学院内部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传统。提出这种自我否定的思辨能力，应该系统化地在学科的设立和院与院之间，系与系之间的交流里面，

得到推广，以成为一个积极的土壤，而不是仅仅靠人为的一种缘分。

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系主任刘永华教授，从上戏的独特经验提出了开放办学，多元、跨领域、多学科、多专业交叉的经验。尤其是上戏舞美系的特色，是通过实践来带动教学的必要性。

上海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研究生导师，双百方针工作室主持刘大鸿提出以双百方针为指南的一个强化性的、引导创造性的德育教育和美育教育的可行性标准和模式。他提出要以社会为模特的概念，关心内容就是关心社会。提出要社会不要人体，要命题不要自由，要共性不要个性，要集体不要个人。他的这个概念的提出，旨在引出我们此后展开的第三部分，即不断缠绕着我们讨论的一个主题，就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带着这个问题，座谈会进入了第三部分。“如何展开当代艺术教育？”

第三部分，我们非常荣幸地得到了延安大学和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的支持。延安大学廉振民校长出席了会议。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的冯副院长对整个会议非常关心给予支持，使我们能够在延安大学的会堂举行这个讨论。在场的 322 位老师和学生参与了我们整个会议的全过程。使我们这次座谈会不仅仅是专家学者和艺术界之内的一个讨论，而是和延安地区的艺术教育的生态有了互动和交流。

“如何展开当代艺术教育？”，蔡国强先生介绍了自己在漫长的艺术创作和追求过程中的经验，回顾了自己求学的过程。站在国际的视野中，联系起多年来不断地回到国内进行创作和交流的体会和经验，他对前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讨论，提出不同意见和肯定意见。他尤其强调，一定不要把当代艺术教育体制化，过早地教条化。他强调保证学生的自由、个性非常重要。他对前面两部分的发言中，对学生何为个性、自由提出的质疑的回应是，学生们不是拥有过多的自由，而是不够自由。因为现有当代艺术的教育还不够开放，没有办法去引导学生去认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和个性，于是他们在追求表面自由和个性的过程里面，只是达到了共性和不自由。蔡国强先生发言里面不断强调，不要怕失败。这也是其他这几个部分发言中，几位先生不断联系到一点，就是实验性，不要怕失败。

张培力在介绍他所领导的中国美术学院新媒体系的学科设置，教学大纲和不同的实践教学方法中，也强调了错误和认识错误的重要性，这是教学的开放有机性的一个重要保证。他提出，新媒体不是材料，而是认识、技术、方法等在教学过程中达到的对创作规律的摸索，对新的艺术的表达方式和综合经验，在老师和科学的教学大纲的引导下所达到的一种体验。

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工作室负责人吕胜中教授，在发言中强调写实是人类的遗产，不是问题。在其他部分的发言中也不断地提出了，对国、油、版、雕等系科设立的不同意见。吕胜中教授提出：关键的问题不是写实，或者艺术的媒介和材料，而是如何认识它，如何在新的当代这个时刻去认识它，如何去教、如何去学，目的性何在。除了肯定国、油、版、雕的分类不应该是扫地出门的，还有关键在于要对不同的艺术，材料、方式学科的教学方式，以使这些已经拥有人类已有历史的一些学术，和认识方式能够不断保持，而且能够有新的生命。他还强调，传统和民间同样是实验艺术资源，艺术的新旧不在于材料，不能过分去把当代艺术教育的改革理解为新媒体艺术的泛滥。

吕胜中教授在发言中的重点，也包括理性的建设、人文思想的培养。这个发言同样在其他发言中不断被表达。如何重视史论系学科的建设，如何在创作教学、基础课教学之间能够不把理论的教育，作为一个分开的方面，而是成为一个紧紧相扣在一起的重要环节。同时，吕胜中教授在发言中也谈到，既要注重精英型创作人才的培养，同时这个也和如何培养这些人才，能够同样的适应于社会工作完全不矛盾，只要他们了拥有创造性。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总体艺术工作室负责人杨劲松教授站在理论的高度，从哲学、教育学、文化学的角度为我们做了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用这个理论分析来提出对功能主义教育产业化带来的问题，考试制度的问题，艺术教育市场供需关系的问题，当代艺术展览制度、

创作体系等方方面面和当代艺术教育联系一起产生的问题，对人文、意识形态的认识里面的艺术教育等许多值得重新思辨的角度的问题。

邱志杰用非常丰富的教学材料，一个对藏区文化想象的误区和真实性的一个考察为基础的教育计划，来提出了一个我归纳为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在这里面说的新社会主义是对社会的一个关怀。学生通过这么一个现实主义的方法，开门办学，下乡体验生活，把目前当代艺术界时刻最敏感，最活跃，最有动力的一些话题和意义通过教学来实现。其中包括后殖民主义，文化主体性建构，文化想象和误读。他的这种教学方法同样也在这里提出了，个性和共性的矛盾对立统一在实验艺术教学里面重要性。

陈丹青教授从香港打来电话做电话发言。在简短的对话和发言里回答了我们在场提出的一些问题，再次肯定了现有艺术教育体制是存在弊病的。但同时，陈丹青先生以及之后其他在座各位的发言中都重新做出肯定，虽然现有艺术教育体制是有很多的弊病，可是还是在积极的建构性的参与和努力之中解决它。

围绕着整个三个部分的讨论，最后一部分讨论提出不是要把已经正在建立的几个院校和新形态的系、科成果拿来作为一种模式推广，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出发点拿来检验，是我们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这次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不同的城市和学院、不同的艺术工作范畴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在场。有许多参加长征计划延安站活动的艺术家也参与了讨论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意见。与会者反复地肯定，在延安这样一个革命圣地，这样一个中国现代性之中有积极意义的象征性的地方，以此作为语境座谈大意义。张培力谈到，向往延安超过向往纽约。这么一个轻松的话语，正是回应了我们发起和组织这个活动的动机。我们最近在当代艺术工作的另外都市前线，非常疲倦地进入了这样一个时刻，它充满了难得的契机，同时又进入了功能主义，机会主义和缺少思辨空间的时刻。我们由于延安的吸引力来到这里，像隋建国老师在发言中提到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这次我们给与会代表每人都发了一本作为材料）里面提到很多问题，在中国的艺术教育中揭示、阐释和在艺术教育建设中的讨论等，还是具有非常大的现场意义，并且在国际的艺术生态中也是同样有意义的。杨东平教授在发言中也强调了在延安举办这个会议的意义所在，回顾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背景，再次强调生活和艺术、教育和生活的关系。

与会代表都肯定由长征计划这么一个民间组织尝试来做这么个工作，历史会记下一笔，会有影响。希望这个事情能够继续做下去。系统化、可推广、可复制，使全社会都能够参与到对当代艺术教育的关心和讨论之中。

上面我所做的发言是对整个座谈会至今为止所做讨论的综述。

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利用这个时间进行最后一部分的座谈。有很多发言可能还不充分，有很多意见还要补充。在一个对两天会议的综述和回顾之后，或许我们能再次展开一个讨论。